

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

Economic Growth and Inflation

华 民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教学部副教授)

提 要 根据对中国1980~1987年经济增长和消费增长的分析,认为断言中国通货膨胀是由于工资增长过快或消费膨胀引起的难以令人信服。因此单纯紧缩需求的政策干预不仅不能使通货膨胀得到根本治理,反而会造成经济衰退和停滞,并导致国民经济“紧—松”的周期波动。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有不解之缘。15%通货膨胀率可能是我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相关的临界点。我国通货膨胀形成的因素:人口与收入增长,边际劳动生产率下降,资源枯竭,瓶颈部门的制约,国际收支逆差。治理整顿的目标应该是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进行有效的结构调整。

70年代以来,世界各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无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我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通货膨胀由“隐性”形态转变为“显性”形态,而且愈演愈烈。因此,研究和把握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相互关系,对当前治理整顿目标与政策的选择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近年来中国宏观经济的变动

1980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见表1)。与1965~1980年相比,1980~1987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增长了62.5%,农业产值增长率增长了147%,工业产值增长率增长了10.5%,通货膨胀率也从零上升到4.2%。考虑到改革前实际存在的“隐性”通货膨胀,1980~1987年4.2%的通货膨胀率应该说是很低的。值得注意的是,1980~1987年间我国经济的生长在结构上比过去合理,农业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工业。

我国1980~1987年间的经济高速增长为世人所瞩目。但是,国内外经济学界不少人对这种高速增长却忧心忡忡,并断言,中国经济从1984年开始就出现“过热”现象,由此而产生的通货膨胀属于“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进而推出的政策是紧缩需求。

表1 1965~1987年的经济增长

年 份	1965-1980年平均 增长率(%)	1980-1987年平均 增长率(%)
国内生产总值	6.4	10.4
农 业	3.0	7.4
工 业	10.0	13.2
通货膨胀率	3.8	4.2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89年世界发展报告》

然而,仔细分析最近几年来中国宏观经济的变动情况,不难看到,实际情况并不是这些人所断言的那样。我国的总需求与总供给长期以来基本上是平衡的(见表2)。从总需求的结构来看,政府消费与私人消费均趋于下降。与1965年相比,1987年政府总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了两个百分点,私人消费比重下降了10个百分点。与1965年相比,1987年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确实提高了,但它是以内储蓄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上升为前提的,且两者的增长幅度基本相同。

不错,自1979年以来,中国工资总额的增长速度确实也比较快,但是如果把1979年以来的工

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及物价指数的变动联系起来看(见表3),可以得出:第一,货币名义工资的较快增长往往是为了弥补由于物价上涨而引起的实际工资的下降;第二,实际工资的增长指数略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指数,但考虑到我国执行的低工资制度,实际工资增长略快一点也是合理的,而且工资基金一部分转化成为储蓄。因此,断言中国的通货膨胀是由于工资增长过快或消费膨胀引起的难以令人信服。

表2 中国的消费投资与储蓄

年 份	1965	1986	1987
政府总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	15	14	13
私人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	59	50	49
国内总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	25	39	38
国内储蓄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	25	36	38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89年世界发展报告》

表3 中国近年来的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情况

年份	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平均工资指数 (货币)	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平均工资指数 (实际)	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指数
1978	100	100	100
1979	109.5	107.6	106.4
1980	124.7	114.1	108.5
1981	126.1	112.6	106.6
1982	129.8	113.5	109.0
1983	134.5	115.1	117.2
1984	160.6	136.5	126.4
1985	188.4	140.4	135.5
1986	219.6	153.0	142.0
1987	240.1	153.7	151.7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1988)》

由于中国近年来较高的通货膨胀并非需求过度所致,任何单纯紧缩需求的政策干预不仅不能使通货膨胀得到根本治理,反而会造成经济衰退与停滞,并导致国民经济发展的“紧—松”周期波动。如图1所示,1979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已经发生了三次“紧—松”周期波动,而每一次周期波动的结果都是更为猛烈的通货膨胀。第一次波动周期中通货膨胀的峰值为5.9%(1980年),第二次峰值为8.8%(1985年),第三次峰值更高,竟达到了18.5%(1988年)。由此可见,一味采取经济紧缩这种常规方法来抑制通货膨胀,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这表明,我国当前的通货膨胀一定有着更为复杂的形成机理,从而需要作更为深入的分析。

二、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我国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根据国际经济学

界的研究,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有着不解之缘,在很多情况下,经济增长必须以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为代价。这是因为,在社会所能承受的通货膨胀压力下,那些急需的或特别稀缺的产品、资源和某些种类的劳动力的价格会以最快的速度增长,从而有利于人力资源和非人力资源尽快流向这些能够最有效地利用资源的地方,并提高经济效益和国民经济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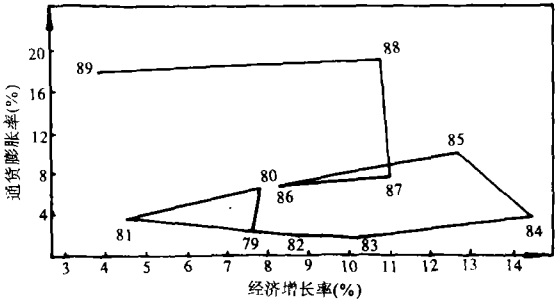


图1 1979~1989年的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

表4 1965-1986年各类国家的年平均通货膨胀率

国家类别	1965-1980 通货膨胀率%	1980-1986 通货膨胀率%
低收入国家	4.6	8.1
中低收入国家(地区)	22.3	22.9
中等收入国家(地区)	21.0	56.8
中上等收入国家(地区)	20.5	72.0
高收入石油出口国	16.4	11.3
市场经济出口国	7.6	5.3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88年世界发展报告》。

表4列举的数字表明,除了高收入石油出口国与市场经济工业国之外,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基本上呈正相关对应关系。即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经济增长缓慢,其通货膨胀率亦较低,反之则相反。如果再进一步分析更多国家的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情况,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间的正相关关系就表现得更加明显。70年代10个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中,有7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了15%,且都为发展中国家;而在10个经济增长最慢的国家中,只有3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在15%以上,且也是发展中国家。少数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率较高但经济增长却较慢,是因为它们的国民经济已进入崩溃边缘,如通货膨胀率已高达国民经济难以正常运行之程度,以及由于外贸条件恶化而引起不可遏制的债务危机等。这也说明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正相关关系不是绝对的,它只存在于一定的界区之内。统计数据还表明,在非洲,超过25%的通货膨胀率就会破坏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

正相关关系;在拉美国家,超过50%的通货膨胀率就会导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在亚洲地区,基本上与非洲的情况相似,25%的通货膨胀率是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呈正相关关系的临界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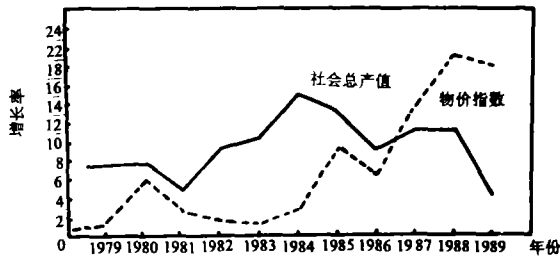


图2 1979~1989年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我国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似,在一定界区内也存在着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正相关关系。如图2所示,当社会总产值的增长率超过10%时,通货膨胀就会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通货膨胀率超过15%,经济增长就会趋于下降。由此可见,15%的通货膨胀率可能就是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正相关的临界点。这一临界点低于世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主要原因是中国长期实行价格管制,人们对于价格变动过于敏感,对通货膨胀的承受能力大大低于那些采取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

三、我国通货膨胀形成的机理

由于我国近年来的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我们必须从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去寻找中国通货膨胀的成因。

1. 人口与收入的增长

经济增长通常总会带来收入的提高。在中国这样一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低水平的收入增长会导致人口的增长。随着收入提高和人口的增加,人们在同一价格水平下就会购买更多的商品或劳务,这必然引起总需求的增长。不仅如此,当人们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以后,还会产生对高档次产品的需求,导致需求结构的变化。由于中国实行平均主义分配,这种需求结构变化的规模之大与时间上的划一性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然而,与需求相比,供给无论是量的增长还是结构的调整,都需要更长的时间,特别是供给结构的调整。这就使需求与供给处于长久的结构性矛盾中。需求与供给的这种结构性矛盾必然造成许多产品和劳务的需求增长快于这些产品和劳务的供给的增长,进而引起这些产品和劳务的价格趋于上升。如果这些价格的上升不能被其他产品和劳务价格的下降所抵销,通货膨胀就将成为不可避免的。而

我国的情况正好存在着价格下降的刚性,有限数量的产品和劳务价格的下降根本不足以抵销由上述矛盾所造成的价格的上升。因此,随着经济增长、人口增加和收入提高而来的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也就不足为怪了。

2. 边际劳动生产率下降

我国人口与就业的压力远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要大得多。政府为了维持社会安定,不得不采取低工资,高就业的政策。然而,这种政策却损害了经济的正常增长,并为通货膨胀的爆发埋下了祸根。高就业政策必然造成企业冗员,从而使企业劳动力供给超过劳动力需求。结果,随着企业劳动力人数的超常增加,每个劳动力所占有的“固定资产”就趋于减少,最终必导致边际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存在着工资下降刚性,那么企业就只能通过提高产品价格来弥补由于边际劳动生产率下降而引起的利润损失,从而成为通货膨胀的推动力量。从表5所列统计数字来看,1966~1978年工业劳动力增长最快(年均8.1%),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仅年均2.1%;1958~1962年,虽然工业劳动力的增长率较低(年均4.1%),但是由于工业投资急剧下降,结果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为负数(年均-0.2%),而工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率仅为3.8%。1978~1987年,由于工业劳动力增加率仍然较高(年均6.9%),而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明显的提高(只高于1952~1987年平均值0.3个百分点),与1952~1978年相比,劳动生产率的作用还下降了0.6个百分点,与1952~1987年的平均值相比,则下降的更多,约为1.8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在我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边际劳动生产率下降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正因为如此,国民收入的增长往往与社会劳动力的增加量呈正相关关系,而劳动力的较快增加又会进一步导致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这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困难所在,同时也是中国通货膨胀不断加剧的根源所在。当然,在劳动生产率下降,企业亏损的条件下,也可采取政府补贴或减免税的办法使物价维持不变,但这会引起政府财政的恶化,最终还是会产生由政府财政赤字而造成的通货膨胀。

3. 资源枯竭

从全球角度看,自1975年以来,由于世界石油储备量的下降,导致石油价格飞涨。油价上涨曾使整个世界面临通货膨胀压力,其规模之大和时间之长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今天我国同样面临着由于某些重要资源的短缺或枯竭而造成的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我国人均耕地不足1.5亩,农业人均耕地不足1.8亩,由于近几年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乡村工业的发展,还在以每年2500万亩的数量在继续减少。由于土地资源的匮乏与枯竭,我国土

地产品的价格将继续呈上涨趋势,并成为通货膨胀的基本推动力。我国森林覆盖率为12.5%,只接近世界平均水平(20%)的一半,而且,据专家估计,一个国家的森林覆盖率若低于20%,不仅木材不能自给,而且耕地也将难以保证安全。除此之外,中国的水资源和能源储藏量也不同程度地呈严重短缺状态。以这些资源为原材料或基本生产要素的产品价格将趋于上升,这不能不给我国的经济增长造成持久的通货膨胀压力。

表5 经济增长、劳动力增加以及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

年份	国民收入 增长率%	社会劳动力 增加率%	全国职工 增加率%	工业总产值 增长率%	工业劳动力 增加率%	劳动生产率 增长率%	劳动生产率 的作用%
1952-1987	8.1	2.7	6.2	11.0	7.0	3.9	35.4
1982-1978	5.8	2.4	6.8	10.8	6.0	3.7	34.2
1978-1987	7.9	3.0	3.4	12.5	6.9	4.2	33.6
1966-1978	6.5	2.4	5.1	10.3	8.1	2.1	20.6
1958-1962	-3.1	-0.7	6.8	3.8	4.1	-0.2	-5.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1988

但是,一般工业增长率超过能源和基础设施供给增长率总有一个极限,1987年底达到这个极限以后,市场上能源价格急剧上升,并推动其他工业产品价格上升。农业历来就是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瓶颈部门。1984年以来,农业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显然在于,农产品相对价格的下跌,使农村家庭从事粮食生产已经很难获利,于是农民不愿投入,粮食供给减少,农产品价格上涨。另外,随着收入提高,城乡居民对肉类、家禽等副食品的需求急剧上升,但由于农村的资金和劳力主要转向相对收入较高的乡村工业,这些食品的增长同样十分缓慢,从而促使价格上涨。据统计,到1988年初,城市农贸市场的价格上升率即达到了20%,这不能不对整个物价水平上涨产生重大的影响。由上可见,我国近年来较高水平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供给增长不平衡所造成的。因此,制止通货膨胀不仅要经济增长控制在一定的速度之内,更需要经济的全面均衡增长。

5. 国际收支逆差

自1979年以来,对外贸易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由于目前发达国家盛行贸易保护主义,并以新技术革命为契机,大规模调整它们的经济结构,从而使得我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国际贸易条件迅速恶化。其主要表现是,在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的价格相对于制造品价格急剧下降。我国出口商品结构近几年虽然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初级产品仍占很大的比重,1987年为30%,而在占出口商品总额70%的制造品中,附加值高的机械和运输设备等仅占4%,其余66%均为轻纺产品。因此,我国对外贸易的贸易比

4. 瓶颈部门的制约

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有两个瓶颈特别重要。其一是重要基础设施服务的供给,特别是能源和交通运输的供给,其二则是农业。在1987年和1988年,整个工业增长了18~20%,而能源供给在这两年只分别提高了5.2%和4.2%,货运量也只分别提高了9.2%和5.1%。前些年工业生产之所以能以高于能源供给的速度增长,主要是因为能耗较少的部门的高速成长,如高档耐用消费品。

价(平均出口价格指数与平均进口价格指数之比)逐年下降。如果以1980年为100,我国1984年的贸易比价为97,1985年为95,1986年为83,1987年为87。这种情况造成了我国国际收支的巨额逆差,1986年其差额高达70.34亿美元。为改善国际收支状况,政府不得不调整汇率,限制进口。但这样做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推动了国内市场价格的上漲,从而使通货膨胀变得更加猛烈。

四、关于中国通货膨胀治理的思考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不能期望完全依靠总量压缩来消除通货膨胀或将通货膨胀率降至安全点。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自1989年第三季度开始的经济增长的停滞已对就业和居民收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正在造成越来越大的社会问题。与此同时,经济进入滞胀状态的各种征兆也正在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将中国治理整顿的目标由单纯的总量压缩及时地转变为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进行有效的结构调整已经刻不容缓。

当前进行结构调整的主要任务显然是:(1)消除经济长期增长的瓶颈;(2)根据需求结构的变化调整供给结构;(3)继续调整出口商品结构以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为完成以上这些结构调整的基本任务,不仅需要转换治理整顿的目标,而且还必须对治理整顿的政策措施进行相应的调整,并对整个经济体制加以必要的改革。

毫无疑问,结构调整与宏观经济的紧缩是截然不同的。宏观经济紧缩是为了解决中国经济增长中需要紧急处理的问题,其目的是求得经济暂

时的稳定;而结构调整则是为了排除阻挠经济长期增长的障碍,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国民经济较快的增长和较高的效率。由于存在以上区别,结构调整的政策措施就必然不同于经济紧缩的政策措施。一个基本的区别是,结构调整往往需要有一系列涉及范围更广的政策措施,而且其政策影响力要能够渗透到国民经济运行的微观层次。根据中国结构调整的主要任务,我们认为当前的产业政策至少应当包含以下内容:第一,制定“生产倾斜”政策来消除结构性瓶颈;第二,制定保护和扶植“特定产业”的政策,使供给结构尽快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第三,制定“振兴贸易”政策,以加快出口商品结构的转换。为使这些政策落到实处,政府必须综合运用财政、税收、金融与外贸等政策手段,通过财政补贴、减免税、低利融资、区别性融资、择优融资、特别偿还,以及外汇配额等措施来加快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转换。

结构调整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资源重新配置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存量要素的调整;二是增量要素的调整。中国目前既缺少存量要素的调整机制,也缺少增量要素的调整机制。存量要素的调整机制是市场。然而,由于传统体制的制约,我国历来就没有完善的市场体系 and 市场机制。到目前为止,要素市场尚待发育,价格仍存在严重扭曲和僵化现象,市场的地区分割和封锁比比皆是,因而我国存量要素的大规模调整至少在目前是不太可能的。增量要素的调整

机制主要是政府计划,但是,由于十年改革,原有的集中计划调节功能已严重弱化,无论在投资、生产,还是在收入分配方面,均由于企业扩权与地方分权而使中央政府的调节作用大大下降,这意味着增量要素的调整也不可能象过去那样有效,况且增量要素调整本来就不是结构调整的最好方法。由此可见,中国当前的结构调整不仅需要政策的调整,而且更需要体制的转换与变革。在现行体制下,由于不存在要素重新配置的机制,即使有再好的政策也解决不了面临的一系列结构问题,也不能使通货膨胀得到有效的治理。事实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还不仅于此,完善的市场体系与市场机制不仅有利于资源的重新配置,而且还有利于消除或弱化价格与工资的下降刚性,而这对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

当然,真正的结构调整比之紧缩要困难得多。结构调整的困难在于:第一,其紧迫感远不如稳定经济的紧缩,因为它所要解决的主要都是一些长期问题;第二,结构调整会使少数人受到明显的损害,而给多数人带来的好处却又不那么明显;第三,结构调整的效果是逐步产生的,需要较长的时间。所有这些,都会使决策者在进行结构调整时产生动摇,从而丧失结构调整的良机。对于这一点,在今天应当引起决策者足够的注意。

(责任编辑 冷远猷)

(上接第13页)

再以调整产业结构来说,这也同样有赖于多方面因素的作用。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大力发展新兴产业。这依然是一个需要增加科技开发投资的问题。新兴产业如何才能在我国起步,成长,壮大,不外两条途径。一是国内研制,技术创新、推广,二是从国外引进,国内消化吸收、推广。无论前者或后者,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都难以奏效。假定现阶段科研与发展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偏小,缺乏通过科技开发而发展新兴产业的资

金,产业结构的调整也会受到阻碍。

这就充分说明,不仅为了解决眼前的市场疲软,而且为了保证今后持续的市场繁荣,在科技开发投资数额偏少和科研与发展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偏低的条件下,我国都有必要不断增加科技开发投资。

(责任编辑 冷远猷)